

馮玉祥遊俄

王禹廷

馮玉祥與西北軍之十六

互相利用一拍即合

馮玉祥遊俄

蘇俄革命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，受到東西兩面的夾擊，處境艱危。在東方，它最怕的是強敵日本，因此千方百計的「聯華制日」，史達林曾經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公開講過：「蘇聯決不能失去中國。此時蘇聯最大的敵人還是英國，英帝國主義者力謀扼殺蘇聯的成長。……進攻莫斯科，必須絕大的陸軍，雖拿破崙之雄，亦大敗而去。英國海軍，對蘇聯幾無用武之地，必須與德、日兩國拉攏，東西夾攻。所以蘇聯必須與波蘭、中國緊密的結合，這是蘇聯接壤的兩個陸軍國家，也就是保障蘇聯的要道。」他們所打的如意算盤，是煽動日本軍閥，挑發中日戰爭，鼓動中國人起而抗日，替俄國人作挨打的槍靶。蘇俄則在「東線無戰事」的情況之下，獲得了安全屏障，從事於它新國家的建設。以後中日兩國關係的惡化，可以說完全中了蘇俄的狡計。陰險險賊的蘇俄人，既想爭取中國，牽制日本。又不願見有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，對它構成威

脅。正巧民國十二、三年中國的局面分裂混亂，它便向中國具有實力的各方面，同時進行拉攏。只要能達到它牽制且抗拒日本，分裂并赤化中國之目的，它就毫不放鬆的多方爭取。對於北方政府，它派有公使（那時各國駐華使節，都是公使。直到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數年以後，才升格為大使。）加拉罕，駐在北京，維持邦交。對於南方，它派越飛為代表，與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政府，建立關係。此外，它對北方的幾個大軍頭，如張作霖、吳佩孚等人，也都動過腦筋。但是張作霖一向「反俄」，吳佩孚并不「反日」。而且張、吳兩人，都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，根本與蘇俄格格不入。所以雖有接洽，却無結果。只有馮玉祥，既與南方的國民革命有關聯，對於國民黨所採取的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當然遙遙響應。而且馮的大軍，駐在京畿及察、綏地區，與外蒙接壤，可以直通俄國，連絡運用，比較方便。於是俄國便把目標擺在馮玉祥的身上。

馮玉祥於二次直奉戰爭後，遭受段祺瑞的嫉視，張作霖的壓迫，偏促京畿一隅及察、綏貧瘠之區，處於內線被大包围的不利態勢。既無海口以通外援，又無兵工廠從事生產，而且財用窘乏，不足以養大軍。他必須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，尋求大突破的辦法，以圖生存和發展。他對內的各種突破，進行的并不順利。雖然把李景林打垮於天津，但郭松齡敗死於新民，孫傳芳背盟於江蘇，岳維峻失敗於河南，更形成孤軍奮鬥，數面作戰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。至於對外，只有爭取「俄援」的一條路可走。

這便是俄、馮雙方利害相同，互相爭取的原因。其中奔走牽線的則是徐謙。

徐謙別號季龍，安徽人，滿清末年的翰林，曾到日本研習法律，以後參加了革命。他是當年人所稱道的「革命三翰林」之一，（其他兩位是湖南的譚延闓浙江的蔡元培。）追隨國父，奔波南北，一度當過國父的秘書長。民國六、七年間，馮玉祥任十六混成旅旅長，駐在北京、天津之間的廊房，徐對馮就很注意，扯上一點同鄉的關係，因而結交。馮玉祥發表「武穴主和」的通電時，國父深為讚許，在寫給馮的信中，

曾有「徐君季龍來粵，又詳述執事救時苦心」之句。此後徐常在北方，與馮保持着良好的關係。十一年馮軍移駐北京，以至首都革命前後，徐謙常到馮處，成爲國民黨的代表人物。其時共黨首領李大釗，住在北京，在蘇俄使館庇護之下，從事活動。徐謙與李大釗，來往的很密切。李透過馮的秘書毛以亨居間連絡，向馮透露蘇俄有意援助西北軍的武器。馮當時是涸轍之鮒，急需甘泉，自然正中下懷。乃派其參謀長劉驥，外事處長唐悅良等，經過李大釗的介紹，與俄使加拉罕直接接頭。於是俄接就開始運來，馮玉祥爲了便於接運，派出大量兵工，把通往外蒙的公路，迅速關修通車。同時把由綏西經過寧夏通往甘肅的公路，也以兵工修通。十四年四月，第一批俄援軍械，運到內外蒙交界的滂江，馮玉祥曾派他的大將張之江，率領必要人員，前往迎接。其對俄援希望的殷切和重視的程度，由此可見。

鮑羅廷拉攏馮玉祥

當蘇俄開始援馮的消息傳出之後，日本政府的田中內閣，大爲着急，曾力圖加以破壞。一面由衆議院議員德川，到張家口向馮遊說。一面示意松室孝良和太倉喜八郎到張家口見馮，願意提供貸款日幣八千萬元，作爲開發河套的資金。誘之以利，希望馮玉祥不要接受俄援。馮對日素無好感，此時見他們幣重言甘，顯係不懷好意，故而權衡利害，予以拒絕。俄人得到此一消息，深恐馮氏有變。其駐在廣州，担任國民政府顧問的鮑羅廷，親率顧問多人，由粵趕來，加強觀察和拉攏。有一天，鮑氏及其隨員，在張家口參觀馮的

軍隊。其中有些自命是蘇俄軍中的神槍手，存心賣弄，表演實彈射擊，每人連發三槍，百碼之內，皆中紅圈。俄人自以爲了不起，故意露一手給馮部官兵看，以鳴得意。殊不知此等技能，正是馮軍之擅長。馮氏不甘示弱，立即還以顏色。當命其衛隊團團長馮治安，也發三槍，則中紅圈中的紅心。馮自己又發三槍，也中紅心。直把鮑羅廷看的目瞪口呆，大鼓其掌。馮氏爲了顯示其軍隊的精練程度，以堅俄人的信心，乃繼續表演下去。命各高級將領作障礙競走，兩人高的牆，兩丈闊的溝，孫連仲、梁冠英等皆一躍而過。石友三翻鐵槓，連續做了五、六十個「鴿子翻身」。騎兵表演馬術，時而翻身於馬腹下，時而躍落於地上，馬依舊在奔馳，人也依舊在耍刀弄槍。步兵的劈刺，不但動作整齊，而且耐力很強，歷時半個鐘頭之久而無疲狀。跑步與大刀隊，更爲馮軍的特長。演練的非常精彩。經過這一場表演，鮑羅廷及隨行諸人，皆嘆爲觀止，認爲除砲兵外，中國的精兵，非此莫屬。於是對馮軍的援助，更加確定。同時也派了顧問若干人，到馮軍工作，其首席顧問當時皆稱爲「林顧問」，究竟是林什麼斯基或什麼夫，其確切姓名今已無法查考了。俄援武器由俄國運到察哈爾，須先由西伯利亞鐵路，輸送到上烏丁斯克，再用汽車接運，經過外蒙古的庫倫，轉送到張家口。所以上烏丁斯克和庫倫，乃成爲兩個很重要的轉運站。馮氏一面向北京政府外交部，保荐毛以亨爲駐上烏丁斯克的領事。一面派其副官長張允榮，前往庫倫，設立辦事處。分別辦理交涉連絡及軍火接運的事宜。

馮玉祥加入國民黨

民國十四年底，吳佩孚、張作霖合作討馮之勢已成，馮玉祥處境孤危。爲了緩和局勢，保全實力，當於十五年元月一日，通電辭職，出洋遊歷。四日離開張家口，暫住平地泉（集寧），辦理出國手續，準備經庫倫赴俄國。旋於三月二十三日，離開平地泉，偕其夫人李德全及徐謙、李鳴鐘、劉驥、鄧哲熙、李興中，及傳令衛士等，官兵二十餘人，前赴庫倫，蘇俄林顧問及副官譯員等三人亦同行，外蒙政府曾派代表在中途歡迎。其時外蒙雖在蘇俄嗾使之下，宣稱獨立，中國政府則始終未予承認。其一切內政外交的推行，皆由俄人在幕後操縱，而俄人則堅決不准外蒙政府，與他國政府尤其是中國政府有所接觸。馮玉祥到達庫倫前後，曾發生幾件頗爲困擾的問題。其一是馮氏及其辦事處與外蒙政府之間，只能算是黨（究竟是國民黨或共產黨，當時并未指明。與黨（外蒙人民革命黨）的聯繫，不能認爲是兩國政府之間的來往，雙方人員見面，均以同志互稱之。其二是俄方要求馮氏諸人，對於共產主義須有相當瞭解。他們爲了考驗馮等態度，曾一度把軍援停運。馮等經過一陣臨時惡補，才勉強應付過去。其三是外蒙政府，向馮氏提出對外蒙古獨立予以承認的要求。這件事是由正在訪問庫倫的地下內蒙自治政府主席白雲梯，事先得知消息，透露給馮的。馮氏幾經熟思，并與隨行的人員慎重研究，決定不能答應。但如何應付，頗感爲難。經過幾番折衝，且請蘇俄駐蒙大使康克格利從中斡旋。最後由馮式邀晤白雲梯和外蒙國務

總理丹巴，當面談判。馮氏表示：「我答應承認外蒙獨立，但要等到我們革命成功之後。」丹巴問馮：「爲什麼現在不立即承認？」馮答復的很妙，他說：「蘇聯給我們的軍械接濟條件，爲革命成功後，依其價格償還五分之一。蘇聯都放心我們，難道你們還不放心，疑慮我們的革命永不會成功麼？」這一麻煩而難決的問題，就在這樣輕輕描淡寫中消解了。

馮玉祥的駐庫倫代表張允榮，爲人性情開展而長於交際，他去庫倫時，曾邀請熱河籍的蒙人李丹山同行協助。當初馮玉祥開府張家口，經營邊防，對於蒙古人士，特加重視和籠絡。地下的內蒙古自治政府，就設在張家口，而爲馮氏所優容，其中容納了許多內蒙有志之士。而熱河籍的蒙人，尤爲馮氏所重視。其原因是熱籍蒙人程度較高，在蒙人中具有號召力。其次是熱河在奉軍佔領下，他們與奉軍感情不好，馮氏有意借重他們的力量牽制奉軍。李丹山即爲其中的重要份子，想不到東邊栽樹西邊成蔭，在對外蒙的關係中，竟派上用場起了大作用。外蒙人知道張家口有內蒙之地下政府，對馮氏已早存好感。李丹山是內蒙領袖人物之一，他曾與外蒙領袖開過好幾次全蒙古民族代表大會，跟外蒙的政要都很熟。蒙人一家，感情融洽，接頭說話，比較方便。馮玉祥爲事擇人，可說物色的非常適當。張允榮和李丹山到庫倫以後，聯手辦事，很快的打開了局面，與外蒙政要建立了良好的關係。他們常以酒宴或便餐，款待外蒙政府的要人，國務總理丹巴以次的人，多爲座上客。飯前或飯後，照例打八

圈衛生麻將，賭資由辦事處先墊，客人贏了，固然把所贏的錢全部拿走，輸了也把沒有輸完的錢同樣拿走，算是欠辦事處的一筆賭債。久而久之，張允榮的辦事處，無形中成了外蒙政府人員的俱樂部。由於這種公共關係的好，雙方公私來往，就非常方便而順利了。因此，馮氏到庫倫以後，便受到熱烈歡迎，一遇某些棘手問題，也很容易的應付過去。馮玉祥爲了表示禮貌，曾經大擺酒席，歡宴外蒙政府的要員，總統、副總統、國務總理及其以下的各部、會、院首長和其他重要人員五十多人，全體參加，由中午十二時吃到下午三時半，談笑風生，堪稱一時之盛。他們給了馮氏十足的面子，也顯示出雙方融洽的程度。

馮玉祥因爲要等蘇俄政府的入境簽證，在庫倫住了一個多月，除了交際應酬之外，便和同行多人，不斷的研討以後的「大政方針」。最重要的就是對蘇俄的基本態度，經過反覆商討，雖獲大體結論，但未作最後決定。惟一有決定的，是馮玉祥加入了國民黨。因爲在此期間，國民黨人顧孟餘和俄顧問鮑羅廷都來庫倫看馮，共同商討大計。某天晚上，馮玉祥、徐謙、顧孟餘、李鳴鐘、鮑羅廷等詳談以後進行的具體計劃。×××曾以堅決而率直的口吻問馮：「你擁有中國至爲強勇的軍隊，素抱救國的宗旨，但究竟有什麼具體的、整個的、救國計劃和政見？如果有，而又勝於國民黨的，請提出來，我們將離開國民黨而來扶助你。如果沒有，則請你立刻加入國民黨，接受其主義與政策，聯合一致，共謀國是。」馮氏面對這一咄咄逼人的攤牌性問題，一時無法作

肯定的答復。蓋因他乃是一個直線條的軍人，對於複雜的政治問題，素乏深刻研究，只有革命救國之心，却無具體而有系統的計劃和政見。而跟他來往的國民黨人，也從來沒有人向他單刀直入的提出過如上的問題，現在面臨關鍵性的時刻，他就下了加入國民黨的決心。

在莫斯科的各種活動

馮玉祥一行乘坐汽車六輛，於四月底離開庫倫。蘇俄駐外蒙大使康克格利夫婦，一直送到俄蒙邊界的特羅色，始行折回。五月一日晨，進入俄境，邊界俄軍列隊奏樂，隆重歡迎。俄人表示，這是滿清末年，李鴻章訪俄以後，第一次再見的盛大儀式。可見俄人對於馮氏訪俄的重視。續行二日，到了上烏丁斯克，休息兩天，換乘火車，繼續西行。馮氏上車的第二天，突感頭暈有心臟不適的症狀，隨行諸人，都勸他下車休息二、三日再走，馮氏堅持不肯。一直苦撐了六天，於五月九日到達莫斯科，下榻於蘇俄政府專門供給外國人旅居的歐州飯店，俄方派了格別烏（情報機構）的兩位軍官，担任侍衛（監視）。

馮玉祥到俄後，有關軍援交涉，先由林顧問接洽辦理。在這進行的空檔期間，他便利利用餘暇，從事參觀訪問。首先值得一提的，是他應邀到中山大學的講演。日期是他到莫斯科的第三天，時間是晚上八點鐘，馮氏提前半小時到達，即有一羣學生，和他周旋聊天，表示歡迎之意，其中有他安徽同鄉陳紹禹、王同慶諸人。八點鐘進入會場，學生們舉出八位主席，共同主持，有位現任監察委員的山西籍某女士，即爲當時的主席之

一。講演開始前，先由該校校長狄克致歡迎詞，介紹馮氏，強調「他是破產的農民而當兵，故能維護農民的利益，而中國北方尤需要他。」拉狄克講罷後，馮玉祥即起立講演，開頭就說：「我對資產階級永遠是倒戈者，『逼宮』一劇也是我演的，把宣統趕出紫禁城，等於把中國幾千年來皇帝的根拔淨了。」這開場白的第一砲放得很響，台下的掌聲如雷，聽眾都顯露出滿臉的欣愉之色。

接下去講述他革命救國的過程及其以後的抱負，實大聲洪，滔滔不絕，一口氣講了七十分鐘。他長於講演，深入淺出，雅俗并見，頗具吸引力及煽動性。能够扣緊聽眾的心理，抓住聽眾的注意力，每講完一個段落，即獲得台下的無數掌聲，全部講完以後，得到的掌聲更為熱烈。

馮氏這次講演算是很成功的。以後該校各小組開會，曾討論應否援助馮軍的問題，主張援助者大多數。這一反映，對馮氏是有利的，經過民主集權的考驗，他算是得到了很高的分數而及格了。從此該校國共兩黨的學生，便常常和馮氏有所接觸，尤其是國民黨籍的人，知道他具有真正的反共決心之後，來往的更較密切。

走筆至此，筆者想把莫斯科中山大學及東方大學的成立經過及其概況，作一個簡單介紹。

東方大學與中山大學

東方大學，隸屬於政務院的民族部。它成立的時間較中山大學略早，是一個收納東方各民族革命者的訓練機關。其中有中國人、日本人、韓國人、印人、馬來亞人、越南人、緬甸人、泰國人、印度人，以及蘇俄國內的各少數民族。東

大訓練的作用，一方面是灌輸共產革命的理論和策略。一方面誘使受訓者對共產祖國——蘇俄發生向心力，而對其自己的國家發生離心力。當時受訓的人年齡大小和程度高低，差異很大。自十幾歲至五、六十歲不等，有工人、有小學生，也有大學教授。所以施教方面，與普通學校完全不同，雖然訂有學科而不甚注重，最注重的是小組會議及其結論。中國人在東大受訓的，先後約八百人，共黨頭子劉少奇、任弼時，皆係該校的早期學生。

中山大學是在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初期，經過雙方同意，專為中國留俄學生而設立的。校長是拉狄克，中國國民黨駐該校的代表是邵力子（也在該校正式受訓）。拉狄克是奧地利籍的猶太人，和列寧關係最深，為蘇俄開國五元勳之一，與列寧、托洛斯基、布哈林、齊姬林等齊名。列寧死後，他與斯大林的關係相當密切。擔任消息報總主筆的時間很久，他所寫的社論，一般認為是蘇俄政府或斯大林的代言。以他這樣的人出任中山大學的校長，足以顯示中大的重要性和蘇俄對它的重視程度。

當時在廣州的國民政府，對於送往中山大學留學的學生，同樣的寄予很大的希望，選拔的標準也很嚴很高。投考資格原定為國內外大學修業兩年為合格，後經俄顧問鮑羅廷建議，有同等學力者亦可錄取，乃把尺度稍為放寬。廣州由國民政府公開招考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其他大都市，則由國民黨黨部秘密選送。民國十四年深秋，在廣州報考者有一千餘人，僅錄取了一百五十名

，係譚延闓親自主考。他們離粵出國之前，黨政機關均曾分別歡送。國府主席汪精衛，在送別茶會上致詞，根據他的經驗，分析留法勤工儉學失敗的種種原因。祝望這次留俄同學，整個的去，整個的回，學習以愛祖國愛民族為前提。在粵錄取的學生，由香港乘船到海參威，轉搭西伯利亞鐵路火車，前往莫斯科。在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等處錄取者則各由海道或秘密經過東北，分赴海參威，換乘火車赴莫斯科。尚有少數人原在歐洲各國留學，經特別保送，轉入中山大學。計自十四年到十八年為止，先後在中大留學者共有一千二百人之多。其中國民黨員及共產黨徒均有，他們在俄留學時，鬥爭的非常激烈。回國後各到其所屬的陣營（也有分別轉變，參加對方陣營的。）國民黨人都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堅決反共，奮鬥到底。共黨份子也皆執迷不悟，一直肆行其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。雙方都產生了頂尖角色和骨幹份子，除了馮玉祥、于右任，都因與中大有點淵源而為名譽學生而外，其正式留學的也多是負黨國重任的領袖人物。勤政愛民全國上下一致擁戴的今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，倡導世界反共聯盟的谷正綱先生，都是當時的傑出人物。至於我們的敵對方面，周恩來、葉劍英、吳玉章、陳毅諸僉，則是十六年武漢分共以後，逃往莫斯科，編入中大特別班。陳紹禹、秦邦憲、張聞天、鄧小平，也是中大的學生。

除了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以外，當時在蘇俄各軍事學校受訓的，先後也有二百多人。總計起來，由民國十四年到十八年之間，我國赴俄留學

的文武學生，共在兩千人以上。這一時期，堪稱爲「留俄熱」時期。在人數上，留俄學生雖然比不上清末民初留日學生之多，但對我們國家所發生的正反兩面的影響，似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對水利問題有興趣

此外，在蘇俄政府的安排下，馮氏一行，便到各處參觀農工建設。其中最引起馮氏的興趣和注意的，是頓河上的一座水力發電廠。該廠每隔數里即有一座水壩，壩內蓄水很深，航行也甚便利。俄人告訴馮氏，水白白的流下去，而不利用其力，是非常可惜的。當時俄人以重金聘請美國工程師，并引進新的技術及設備，大力發展水力發電。據說將在基輔設立最大水力發電廠，與頓河、伏加爾河的電力廠合計起來，可以供給俄國歐洲區域的全部需用，而以農村之電氣化爲首要。他們并說：中國的水力，大至無窮，超過蘇俄很多，堪與美國媲美。如黃河、長江、淮水、珠江等大河流的水利。倘行開發，不特可以發電、灌溉、航行，且可減輕水患。馮氏對此極感興趣，好像被軍力以外的另一種力量吸引了。他聽得津津有味，逗留半天還不想走，發問最多，有些問題連在場的俄國工程師也都答不出來，可見他對此用心之深。從那時起馮氏就特別注意水利問題，回國後曾以兵工在西北開了幾條黃河支渠，以利灌溉。抗戰期間，美國水利專家薩凡奇博士來華訪問，研擬長江三峽的水力發電計劃，定名爲中國的T.V.A.（漢譯揚城安），馮氏對此曾寄予很大的希望。惟因抗戰正殷，軍事第一，政府無力從事於此一薄利民生的偉大建設。抗戰勝

利後，建國大業即將大規模的展開。馮氏請准政府，赴美考察T.V.A.水利工程，并帶了兩位水利專家爲隨員，打算在那裏作深刻的研究，吸取寶貴的經驗和技術，準備回國以後，專心致力於水利建設，以利民生。其時報紙所發布的消息，說是總統 蔣公對於馮氏此行，頗爲贊許與重視。并表示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的水利建設，願與馮氏各任其一。可惜馮氏在美考察完畢，搭乘俄輪前往俄國，進入黑海之時，突然死於船上。當時蘇俄官方宣布，馮氏是心臟病猝發而死，但國人多不置信。究竟他爲什麼要去蘇俄？到蘇俄幹什麼？及其真正死因爲何？曾有各種不同的說法，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揭開的謎。這個謎，也許永遠不會揭開了。

馮玉祥堅拒入共黨

馮玉祥在庫倫停留期間，蘇俄林顧問曾勸告他，爲了到莫斯科請援方便，以及爾後加強合作，希望馮氏及同行諸人都加入共產黨。當時馮的左右，對於此一問題，大體上分爲贊成與反對的兩種不同意見。贊成的是以徐謙及馮妻李德全爲首，反對的以李鳴鐘與毛以亨爲主，其他的人也都各有所見。馮氏的內心則偏向於不加入的一邊，但他爲人深沉，在庫倫這個複雜的環境中，不肯輕易的有所透露。他們認爲此一問題關係太大，曾經過多次的討論。雙方對於加入不加入共產黨，倒不完全是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不信仰。主要的是考慮到切身的現實問題，那就是俄援的給不給。主張加入的一方，認爲既然是赴俄求援，自以能順利而且大量的取得俄援爲惟一要求，

只有加入共產黨，才能達到這一目的。不主張加入的一方，則認爲俄援的給不給，與加入共產黨不發生直接關係。而是看我們有無力量，有無被利用的價值。如果有，不加入共產黨，蘇俄也會給援助。否則的話，縱然加入共產黨，俄援還是不見得會給的。馮玉祥曾和李鳴鐘、毛以亨單獨秘密交換過意見。李鳴鐘曾經說過幾句份量很重要的話：「只要我們有實力，誰不想利用我們？如果不要國家，祇有做漢奸。」馮也很懇切的答復他：「我決計在不喪失光榮的前提下，爲本軍，爲國家，奮鬥到底。」馮玉祥和毛以亨的密談，則在鄭重而帶點半開玩笑的口吻中，每含着耐人尋味的機鋒。因爲他兩人的此一談話，決定了馮氏的基本立場和態度，關係十分重要，特根據毛氏所記，把他們當時的對話，擇要錄在下面：

馮：「你看蘇聯情形如何？」

毛：「好的很，比中國強，中國要趕上蘇聯，至少還要一百年。」

馮：「你看外蒙如何？有一百年能否趕上中國？」

毛：「不需要，外蒙人民革命黨改爲共產黨後，即可比中國強。」

馮：「我看這世界是個左傾世界，越左越好，我們絕不能右傾。」

毛：「誠然。」

馮：「你看我們加入共產黨如何？」

毛：「好的很，那麼我們連莫斯科也用不着去了。」

馮：「爲什麼？」

毛：「因為共產黨是要服從講紀律的，我們聽莫斯科命令就好了。用不着去交涉，交涉乃對等之事，是黨的紀律所不許可的。」

馮：「我此次赴蘇聯是效申包胥秦庭之哭呀！不過欲哭無淚而已。」

毛：「連哭都為紀律所不許可的，這叫做鬧情緒。」

馮：「哭的自由都沒有，那麼我不成為蘇聯

的奴才麼？」

毛：「倒不是奴才而是同志，不過自由是一樣沒有的。」

馮：「那麼我們不加入共產黨，蘇聯會援助我們麼？」

毛：「我可能得到援助的機會倒很多，黃埔軍校與我們都非共產黨，因為合乎援助的條件，故能得到援助，而真正共產黨員却未得到援助。所謂合乎俄人援助之



前往庫倫勸說馮玉祥加入國民黨的顧孟餘。

條件者，要看我們有無相當力量，擴充起來并不困難，而尤視我們能否供其利用。俄人所需要於我們者，為能否助其牽制日本，蘇聯在遠

東最怕日本。北京政府和張作霖，都與日本有關係，蘇俄發現我們不親日，才來找上我們。只要我們主力不消滅，而且表示堅決反日，俄援就會給我們的。」

馮：「我在共產黨人中，聽見一句與主義有關的話，說蔣介石先生可以代表工人無產階級，而你則為農民破落戶的代表。所以你們都須懂得主義，且使懂主義者都非來接近你不可。」

毛：「我們有了上述的兩付本錢——反日與農民的代表，就够了，加入共產黨不特多餘而且有害。將來我們到了北京，統一中國，總是自己的事業，我們決不為共產黨來打中國，因為如此即等於為蘇聯滅亡自己的國家了。」

談話至此，馮玉祥霍然起立，說：「我寧願光榮的失敗，決不作無恥的成功。我決不做劉豫、石敬瑭之類的兒皇帝，請你們放心好了。」

馮氏說此話時，淚流滿面，態度非常激切。毛以亨當時被感動極了，乃勸慰他說：「這是為國家，只好把自己的成敗利鈍，置諸度外，始可不至為人所要挾。其有所不為者，成功起來，亦比任何人為大。」馮又說：「今日之談，說過就算，一切還要到莫斯科後，看情形再決定。此間環境複雜，務要加倍小心，切不可把我們所談的洩漏出去，尤其對自己人更須注意。」

雖然如此，馮氏的本質，是個陽分人，他口中雖然不說什麼，但態度上已有所不同，對徐謙不像以前那樣熱絡，對李德全所說贊揚共產黨的

話也不接腔。而且因為李德全懷孕，留她停在庫倫待產。到了莫斯科不久，也請徐謙陪同李鳴鐘、劉驥兩代表，前赴廣州，與國民政府接洽連絡。免得他們對於加入共產黨之事，多所曉舌。

馮玉祥到莫斯科後的兩個多月，俄人又要求馮等加入共產黨。馮氏隨員中的多數人，因為到俄已久，請援的事尚無成議，都有點失望與恐慌，所以主張加入。他們認為如果不加入，蘇俄就不會援助，西北軍非根本失敗不可。而且我們已進到蘇俄掌握之中，人家看得起你，叫你加入，你竟敢違反其意，恐怕大家的性命亦在危險之中。但是仍有人堅持以前的看法，反對加入。惟覺得茲事體大，要請馮氏自己決定。馮乃表示了堅決明朗的態度，說：「我誓不做兒皇帝，老早已經講過了。」并吩咐辦理護照，準備離開俄國，到德國去，打算繞道印度，經過西藏而回甘肅。他的左右覺得還未到決裂階段，仍有緩衝餘地，不可輕率舉動，等林顧問來了問個明白再說。

稍後林顧問來，正面勸馮等加入共產黨。他認為加入只有好處，沒有壞處。但他表示這不是蘇俄當局的意思，而是他個人這幾月來為馮辦交涉得到的感覺。因為蘇俄以前的軍械援助，是一種對友軍的援助，一次一案的分別辦理。辦完一案，再繼續一次一案的繼續交涉，重行調查，另作決定。所以就誤時間，不能很快的連續不斷的源源接濟。西北軍因軍火不足，而在冀、察地區之失敗。如果要求訂立永久性不斷援助的計劃，就必須馮等加入共產黨，把西北軍變為共產黨的軍隊，蘇俄軍委會才會統籌考慮。林顧問說的這

番話，聽起來滿有道理，但却對馮氏給了兩個重大的啓示：其一、要馮等加入共產黨，不是完全出於蘇俄當局意思。（這話也不見得完全確實，不過林顧問既然如此說，馮也就作如此認定，裝糊塗賣傻，有時是政治場合中的一種藝術。何況對於外國人呢？）其二、馮氏對於俄援，是要求一次而大量的給，方較可靠。如果訂立長期計劃，分批的給，則有隨時被停止的顧慮。因此，他對林顧問爲了爭取永久性的援助，而要他加入共產黨一事，就不願接受了。他很乾脆的對林說：「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不考慮加入共產黨。」至此，困擾馮氏很久的加入共產黨的問題，才算作了一個決定性的澄清。

事隔五十年，我們回頭研究馮玉祥當時加入不加入共產黨的問題，實在覺得關係重大，影響深遠。如果那時他加入了共產黨，與蘇俄認真而澈底的合作，以後也不在中途變卦。那麼，馮氏個人及其所統率的西北軍，究將變成一個什麼樣子？最後是一個什麼結局？我們的國家又將成爲一個什麼局面？真使人無法想像。甚至國際局勢

的有關演變，也會連帶着有很大的不同，則是無可置疑的事。個人的利鈍禍福，國家的盛衰興亡，往往決定於有關人物的方寸幾微之間。不管是大人物，小人物，凡是有心問世的人，對於一件重大事情的抉擇與決定，可不特別做省、慎重？據說歷經成敗滄桑之後，馮氏晚年，對於他在莫斯科的那一重大決定，曾有感悔之意。其真實性如何，因為沒有直接而正確的資料，可供考證，自不敢妄作評斷。在此前後，胡適由西伯利亞鐵路，赴歐轉美。經過莫斯科，小作盤桓，略事觀察。他與馮玉祥見面時，曾勸馮「西行一步」。胡適的意思，是怕馮氏「赤化」，所以要他到歐、美一遊，看看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政治制度、經濟建設和社會狀況，以增長見識，開擴胸襟，正確思想。其時于右任因為西北軍在冀、察失敗，無法在北京立足。而革命情勢，正到緊張關頭，特專程到莫斯科，敦促馮玉祥早日回國，整頓部隊，響應國民革命軍由粵北伐的軍事行動。恰好馮氏在俄求援的任務，大體上已告完成，於是他們便專程返國了。

海天感舊錄

喬家才著
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